

跨文化交际理论模型视角下中美外交拒绝言语行为对比研究

梁俊武, 陈晖

浙江安防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 温州 325016

DOI:10.61369/HASS.2025040015

摘要： 基于构成要素类、发展阶段类跨文化交际能力模型主要聚焦外语教育和专业建设等研究领域，笔者侧重将对话互动类跨文化交际能力模型聚焦阐释现有外交话语体系。本研究立足跨文化交际能力模型中经典的 Spitzberg 二元对话模型，自建 2020–2024 年中美外交部新闻发布会记者问答小型语料库，借助 Lancsbox 分析工具，分析中美外交拒绝言语行为及跨文化交际策略。研究发现：1) 中美外交发言人在言外之力指示手段上呈现趋同特征，但是在语言使用策略上美国倾向于直接、明确的沟通方式，而中国则更注重含蓄、间接的表达，以及通过强调和判断动词来表达立场，这反映了两国不同的社会语境、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差异。2) 中美双方在动态互动、感知与适应、关系导向、多维度：感知准确性、适应性、灵活性等方面基本呈现趋同。研究中中美外交拒绝言语行为的跨文化交际使用策略，可以丰富政治外交话语分析框架，对中国特色外交话语体系的建立具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 跨文化交际能力；理论模型；拒绝言语行为；策略

A Comparative Study on Chinese and American Diplomatic Refusal Speech Ac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ory Model

Liang Junwu, Chen Hui

Zhejiang Security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Wenzhou, Zhejiang 325016

Abstract： The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model, which is based on elements and stages of development, primarily focuses on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dialogue interaction model to interpret the existing diplomatic discourse system. Based on the classic Spitzberg binary dialogue model, this study constructed a small corpus of journalist Q&A sessions from 2020 to 2024 at the press conferences of the Chinese and US Foreign Ministries. Using the Lancsbox analysis tool, the study analyzed the speech acts and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used in Sino-US diplomatic interactions.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Sino-US diplomats show convergent characteristics in the use of implied means, but in terms of language use strategies, the US tends to communicate directly and clearly, while China emphasizes subtle and indirect expressions, as well as using emphasis and judgment verbs to convey its stance. This reflects the differences in social contexts, ideologies, and value orienta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2) Both sides show convergent characteristics in dynamic interaction, perception and adaptation, relationship orientation, and multi-dimensional aspects such as perceptual accuracy, adaptability, and flexibility. Studying the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used in Sino-US diplomatic speech acts can enrich the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political and diplomatic discourse and has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establishing a Chinese-characteristic diplomatic discourse system.

Keyword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theoretical model; refusal speech act; strategy

引言

拒绝言语行为是语用学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以往拒绝言语行为研究多从语用学、二语习得等领域。外交语境中拒绝言语行为并非仅是对特定议题的简单回应，更是国家形象与外交立场的重要体现。目前，国际形势诡谲，外交环境具有高度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不仅源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价值观念、语言表达和行为规范的多样性，还受到政治、经济、社会以及历史等多种因素的交织影响。过往研究视角从言语行为理论、面子理论、批评话语分析等角度切入，关注外交话语语言表征和概念表征，缺乏言语交际的社会因素和造成社会

因素差异性的动因分析。鉴于此，本研究立足跨文化交际视角，以2020–2024年中美外交部例行记者发布会内容自建小型语料库，借助Lancsbox分析工具，分析中美外交拒绝言语行为具体实践。

一、相关文献综述

（一）跨文化交际能力理论模型

目前，跨文化交际能力模型大致可由构成要素类、发展阶段类、对话互动类三类组成。构成要素类以跨文化交际能力模型为代表的在外语教育界最为典型，分别从知识、态度、技能、意识、动机、行为六个维度阐释跨文化交际能力。另外还有十要素模型、焦虑与不确定性控制理论、基于面子系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模型、跨文化交际能力理论等。发展阶段类描绘了跨文化交际能力自下而上、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具体模型以跨文化敏感度发展模型、跨文化成熟模型等为代表。对话互动类模型基于双方或者多方对话交谈性质，具有动态性强等特点，具体代表模型二元对话模型、过程模型、循环过程等模型。其中，二元对话模型强调在跨文化互动中，沟通能力的动态性和互动性，以及个体在沟通过程中对文化差异的适应和调整能力，适用于研究跨文化互动中的个体行为，例如在跨文化婚姻、国际商务谈判或跨文化交流项目中的沟通能力评估。通过分析个体在互动中的感知、适应和行为调整，可以更好地理解跨文化沟通能力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模型是一个动态的跨文化能力发展框架，强调从个人层面（态度、知识和技能）到跨文化互动层面（结果）的逐步发展，适用于教育和培训领域；提出的跨文化学习交流过程模型强调跨文化能力的培养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具体包括四个阶段：注意（Noticing）、比较（Comparing）、反思（Reflecting）和交流（Engaging）。该模型尤其适用于设计体验式和互动式教学活动。例如，通过角色扮演、跨文化案例分析等方式，引导学生经历“注意—比较—反思—交流”的循环过程，从而提升其跨文化交际能力。

国内跨文化交际成果基于西方跨文化交际成果基础上，大多数学者从外语教学角度探讨跨文化交流能力，同时反作用于外语教学^[1]。具体又从理论和实践角度入手，^[2]如贾玉新在1997年出版的《跨文化交际学》是国内跨文化交际领域的重要著作之一，系统地阐述了跨文化交际学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将跨文化交际能力分为基本交际能力系统、情感和关系能力系统、情节能力系统、交际方略能力系统四个相互联系的维度。^[3-4]在《外语教学与文化》一书中提出了外语教学目的的三个层次：微观、中观和宏观，其中宏观层面即为社会文化能力，包括语言能力、语用能力和扬弃能力，该理论框架不仅强调了语言能力的重要性，还突出了语用能力和文化批判性思维在跨文化交际中的关键作用。

目前，我国跨文化交际能力理论模型多用于外语教学、跨国

商务谈判、跨国法律等领域，尚未形成统一普遍适用于外交话语的具体实践策略，鉴于此，本研究从目前中美外交新闻发布会真实对话出发，尝试分析外交拒绝言语行为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模型，为外交话语提供理论基础。

（二）拒绝言语行为

学界有关拒绝言语行为的定义尚未取得共识，面子理论。提出个体在交际中追求两种面子：积极面子和消极面子。拒绝行为可能威胁到这两种面子，因此需要采取策略来减轻这种威胁。同时，礼貌理论也强调在拒绝时需平衡礼貌和直接性，并提出最小化请求、最大化让步和最小化成本策略，以减少拒绝的负面影响。以上是从拒绝言语行为如何在交际中得体表达拒绝意图，同时尽量减少对交际双方关系的负面影响的相关研究。政治话语中的拒绝言语行为不是简单的否定，它还承载着维护国家利益、表达政治立场和塑造公共形象的功能。因为，政治言语行为参与者不仅包括会话双方，还涉及听众^[5]。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问题

（1）外交拒绝言语行为语言表征有何差异？（2）Spitzberg二元对话模型下中美外交拒绝言语行为实践策略有何差异？

（二）数据收集及分析步骤

本研究选取2020–2024年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发布会问答环节内容，以及2020–2024年美国外交部新闻发布会记者问答环节内容，自建小型语料库。（特别说明，数据采集结束于2024.11.10日）表1为本研究语料库数据对比统计结果。

表1：中美外交部新闻发布会语料库数据对比结果

时间（年）	汉语		英语	
	样本数量	语料长度（字数）	样本数量	语料长度（字数）
2020–2024	1012	7795350	1022	3383589

首先，本数据采用爬虫软件“八爪鱼采集器”分别在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以及美国外交部新闻发布会网站收集原始数据，数据来源网站均为所在国官方权威机构，具有可比性；随后，通过EmEditor正则表达式及人工检索方式降噪；其次，借助语料库分析工具Lancsbox.6.0对数据进行语言层面的分析。由于母体较大，采用Lancsbox INDEX随机检索抽样方法将中美外交拒绝言语行为中使用频率较高的表示否定的语言表征层面进行分析，随后在Spitzberg二元对话理论模型框架下，对中美外交拒绝言语行为为实践策略差异性进行分析，具体研究路径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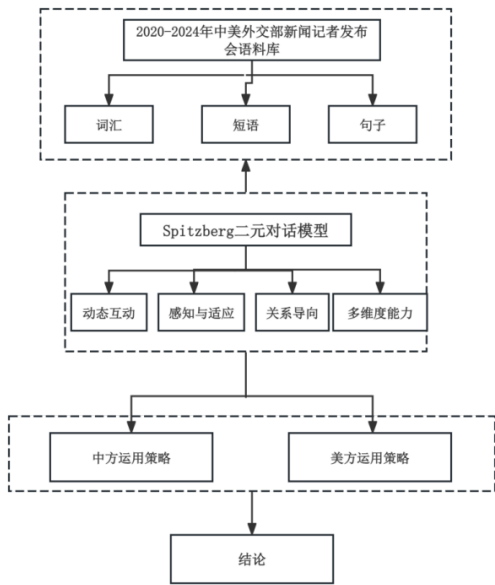


图 1：中美外交拒绝言语行为为 Spitzberg 二元对话理论模型分析

三、研究结果及分析

（一）中美外交拒绝言语行为语言表征对比

基于外交拒绝言语行为特性，具有明确的言外之力指示手段，拒绝效果也因不同言外之力指示手段的差异而不同。言外之力（Illocutionary Force）是指说话者通过言语行为所表达的意图或功能。它体现了说话者希望通过话语实现的行为或效果。言外之力指示手段（Illocutionary Force Indicating Devices, IFIDs）是帮助听者识别言语行为意图的工具或标记具体分布如下。

表 2：美国外交拒绝言外之力指示手段类别

成分	标记词	频次	相对频率
直接词汇（否定）	Not/Not again / repeatedly.....	2613	8.46%
能力、意愿（否定）	cannot /could not /may not /might not /must not /shall not /should not /will not /would not	1688	4.989%
强调短语	Don't know/not familiar with/not aware of that/not certain about	111	0.328%
否定句子	I don't know/ I'm just not familiar with/ I'm not aware of that/ what I can tell you is... and it's beyond my position	/	/

表 3：中国外交拒绝言外之力指示手段类别

成分	标记词	频次	相对频率
直接词汇（否定）	（我们）拒绝 /（不再）重复 /（不做）赘述	1628	2.088%
能力、意愿（否定）	（我方 / 中方）希望 / 愿意 / 无法回答 / 无法评论 / 无法证实 / 无法评价 / 不便透露 /	3058	3.9229%

判断动词	（不）清楚 /（不）了解 /	1409	1.8075%
强调短语	坚决反对 / 绝对不 / 尤其是	1639	2.1025%
否定句字	 已经回答 我建议	/	/

表 2 和表 3 中的数据显示：这些差异反映了中美两国在跨文化交际中的语言使用中：美国倾向于直接、明确的沟通方式，而中国则更注重含蓄、间接的表达，以及通过强调和判断动词来表达立场。这些差异对于理解和改善跨文化交际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在外交场合，了解和尊重对方的文化背景和交际风格对于有效沟通至关重要^[6]。

（二）关系导向

在 Spitzberg 的二元对话模型中，关系导向强调在跨文化互动中，交际者不仅关注信息的传递，还关注关系的建立和维护。在表明自身立场的情况下，最后提出积极性质的对话，这种关系导向的交际能力有助于促进双方的理解和信任，减少误解和冲突，从而实现有效的沟通。关系导向的交际能力可以帮助交际者更好地理解 and 适应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交际风格和期望。通过关系导向的交际，交际者可以展现出对对方文化的尊重和理解，从而建立和维护良好的跨文化关系。

（三）多维度能力

在 Spitzberg 的二元对话模型中，多维度能力是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包括：感知准确性：个体能够准确理解并解释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交际行为和信息的能力。感知准确性是跨文化交际能力中认知方面的一个重要维度，它涉及到个体对文化差异的识别和理解。在外交部新闻发布会场合中，遇到个别语言词汇，能够识别提问者言外之力指示。

明确感知的词汇搭配，在拒绝言语行为中，一般更直接与英语中冠词、人称代词、汉语中的代词和“问题”使用。在跨文化交际中，越是直接明确词汇，交际双方越能清晰感知对方内容。适应性：个体在跨文化互动中，根据对文化差异的感知来调整自己的交际行为的能力。这种能力使交际者能够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灵活地调整自己的交际策略，以实现有效沟通。灵活性：个体能够根据不同的情境和文化背景灵活地调整自己的交际方式的能力。这包括能够灵活运用不同的交际策略和技巧，以适应不断变化的交际情境。移情能力：个体能够理解和共鸣他人情感的能力。在跨文化交流中，移情能力有助于建立信任和理解，减少误解和冲突。通过移情，交际者能够更好地理解对方的文化背景和交际风格。

四、结论

从跨文化交际视角下 Spitzberg 二元对话理论模型，对中美外交拒绝言语行为从语言表征：直接否定、意愿和能力否定、判断否定词汇、强调短语和否定句子进行语料库统计分析，发现：中美外交发言人在言外之力指示手段上呈现趋同特征，但是在语

言使用策略上美国倾向于直接、明确的沟通方式，而中国则更注重含蓄、间接的表达，以及通过强调和判断动词来表达立场，这反映了两国不同的社会语境、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差异。经过 Spitzberg 二元对话模型分析，中美方在新闻发布会动态互动中，互动情景均会影响对答者行为；在感知与适应层面，中美方均会采用调整沟通话题等策略；在关系导向方面，积极建立跨文化交

流从而促进关系积极发展；在多维度层面，双方就感知准确性、适应性、灵活性等方面均有体现，对外话语体系是展示和宣介国家意志、诉求和行动的重要工具，它不仅承载一个国家的传统思想和精神，也体现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和互动过程。研究中美外交拒绝言语行为的异同及使用策略，可以丰富政治外交话语分析框架，对中国特色外交话语体系的建立具有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 [1] 毕卓, 刘风光. 基于仪式规程理论的外交话语冲突性回应策略研究 [J]. 现代外语, 2022, 45(06): 767-779.
- [2] 贾玉新. 跨文化交际学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7.
- [3] 胡文仲, 高一虹. 外语教学与文化 [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7.
- [4] 高一虹. 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 “跨越”与“超越” [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2, (10): 27 - 31.
- [5] 刘风光, 石文瑞, 邓耀臣. 中美政治建议言语行为对比研究以外交话语为例 [J]. 外语教学, 2019, 40 (2): 44-50.
- [6] 高永晨. 中国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测评体系的理论框架构建 [J]. 外语界, 2014, (4): 80 - 88.